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提升审计收费吗?

陈冬^{1,2}, 郭茜林¹, 潘敏³

(1.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 贵州 贵阳 550025;
3.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上海 200122)

[摘要]以2002—2015年我国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审计费用显著更高。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企业的业务复杂度和投资区位复杂度,使得审计师加大审计资源的投入,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审计收费;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审计费用提升更多是审计努力增加导致的,而非审计风险提升导致的。以上研究不仅能够丰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相关文献,而且推动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向会计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延伸。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审计收费; 业务复杂度; 投资区位复杂度; 事务所规模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0)05-0041-10

一、引言

自从2001年加入WTO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规模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根据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母国及投资东道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审计收费一直是审计研究的主要问题。自Simunic以来^[1],国内外学者发现客户规模、业务复杂度、盈亏状况、负债水平、盈利能力、应收账款和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等公司特征,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行业专长、事务所变更等会计师事务所特征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但是,鲜有学者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地,本文从业务复杂度、投资区位复杂度、信息不对称程度三个视角探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审计收费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贡献包括:第一,拓展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会计领域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多从经济学的视角,探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区位选择、投资特征、经济后果等。本文对审计收费的研究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向会计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延伸。第二,丰富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相关文献。魏志华和陈逸群将研究聚焦于向避税地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2]。本文考察不同投资区位的对外直接投资,检验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审计收费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 审计收费的相关研究

关于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Simunic最早提出审计定价模型,指出审计收费体现了审计资源的投入和审计风险的补偿要求,并考察了客户资产规模、业务复杂度、应收账款和存货、涉及行业类型等十个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1]。基于该研究框架,国内外大量文献从客户特征、审计师特征等方面研究了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

[收稿日期]2020-01-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721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6YJC790005)

[作者简介]陈冬(1977—),女,广西来宾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研究员,从事公司税务研究,E-mail:dongchen@whu.edu.cn;郭茜林(1998—),女,安徽马鞍山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司税务研究;潘敏(1970—),女,江西南城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博士,从事审计研究。

从客户特征出发,国内外学者考察了客户规模、业务复杂度、客户风险、盈利能力、负债水平、企业组织结构、产权性质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例如,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业务复杂度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1,3-4];固有风险越高,审计费用越高,固有风险常常用存货、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1,5];债务水平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6-7];公司治理好、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被收取的审计费用更低^[8-9];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提高审计收费^[10-11]。此外,管理层特征^[12-13]、公司战略^[14]、信息披露^[15]等因素也会影响审计费用。

从审计师特征来看,事务所规模、行业专长、审计师变更、审计意见等因素会对审计收费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显著高于其他事务所^[7,16-17];拥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存在审计收费溢价现象^[7,17-20];变更后的会计师事务所通常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以低价招揽客户^[21]。

(二)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国内外现有文献主要从投资动机、投资区位、投资后果等角度出发。

从投资动机上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为主^[22-24]。从投资区位来看,投资目的地资源禀赋、要素成本等区位优势,投资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等制度性因素,双边贸易、投资目的地距离、双边制度差异、投资国类别等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5-26]。从投资后果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出口^[27-28],提升了企业生产率,获得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29-30],提高了企业创新程度^[31]。

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尽管魏志华和陈逸群研究了中国企业向避税地直接投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2],但关注点放在了对避税地直接投资的企业会计行为上。实际上,从投资区位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投向避税天堂,也有大量企业投资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从投资动机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是以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产寻求为主要动机,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现国际避税。本文考察不同投资区位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仅能够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研究,而且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向会计研究领域做进一步延伸。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基于 Simunic 提出的审计定价模型,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了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其中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业务复杂度以及审计风险等是主要影响因素^[1,3-4]。上市公司经济业务、会计事项与组织结构越复杂,审计师进行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审计师面临的审计调整事项也越多,即投入的审计资源越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复杂度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因而审计收费更高。审计费用不仅反映了审计师收集的审计证据的数量,也反映了审计师承担审计风险的额外保险费用^[32]。当客户夸大财务绩效时,审计师的诉讼风险和计划的审计投入更高^[33]。Bedard 和 Johnstone 也发现审计师计划为存在收益操纵风险的客户增加工作量和计费率^[34]。Lyon 和 Maher 认为审计师将其承担的客户业务风险以更高的审计费用的形式转嫁给客户^[35]。国内研究也证实了审计风险的提高会增加审计收费^[36]。根据审计风险理论,审计风险由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等要素组成,在可接受的审计风险一定时,固有风险或控制风险较高,审计师需要通过修改计划实施的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来降低检查风险,审计师需要的审计证据更多,这相应地增加了审计师的工作强度和难度,提高了审计成本。此外,审计师需要承担客户的审计风险,可能因为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而面临法律诉讼风险,遭受经济和声誉上的双重损失,因而收取更高的费用作为风险补偿。本文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引起其资产规模的扩大和业务复杂度的提升,此外,在海外经营的企业需要按当地会计准则要求生产会计信息,并将投资国企业会计准则转换成用于报表合并的信息,这意味着审计师需要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准则、税制或需要聘请境外审计师协助审计工作等。这些因素导致审计师在对这类企业进行审计时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增加了审计成本。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资产规模的扩大和业务复杂度的提升会提高企业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增加审计费用;在不同投资区位的制度环境下经营风险和法律诉讼风险也会有所提高,这会增加审计师审计失败的风险,产生风险溢价,从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审计费用的上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审计费用更高。

(二) 会计师事务所类型的调节作用

会计师事务所特征也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聘请不同特征的事务所进行审计可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分析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

从审计资源投入的角度来看, 国际“四大”在建立声誉以及培养专业技能方面的投入远多于普通事务所, 审计质量也优于非“四大”事务所^[10,37-38], 高质量的审计也会要求更高的收费以补偿其审计资源的投入。此外, 国际“四大”作为“大所”在国际上享有更高的声誉和品牌效应, 常常存在着声誉溢价。同时, 国际“四大”事务所由于经常从事国际审计业务, 具有广泛的国际业务资源, 更能把握国际市场, 具有更强的风险感知能力, 对风险的把握能力更强, 因此其面临的审计风险较低, 在审计过程中可能节约人力资本等审计资源, 审计成本可能更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 一方面, 国际“四大”在面对复杂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以及不同投资国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给会计处理带来的影响时, 通常能够表现出更高的专业胜任能力, 投入的审计资源更多, 审计质量可能更高, 进而收取的审计费用更高, 还可能因会计师事务所品牌声誉溢价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 由于国际“四大”事务所对国际市场的风险把控能力更强, 其面临的审计风险更低, 因此可能收取更低的审计费用。因此, 需要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上述推论。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从审计资源投入的角度看, 建立行业专长优势需要投入高昂的资源成本, 而这种成本是一种沉没成本。为了获得相应的回报, 具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会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此外, 具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通常具有较高的审计质量^[39], 这种审计质量的异质性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以弥补具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在审计时的资源投入。从审计风险的角度看, 拥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通常掌握了客户所在行业的经营特点、交易流程等知识^[40], 能够做出更准确的审计判断, 提高审计效率^[41], 降低审计风险。面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更加复杂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以及不同投资国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给会计处理带来的影响时, 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通常会调用其在该领域的专业资源来提高审计质量, 投入更多审计资源。同时, 具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在审计特定行业业务时具备更专业的知识、经验、能力和动机, 可以识别和判断企业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其面临的审计风险较低, 收取的审计费用可能较低。因此, 需要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上述推论。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 2002—2015 年我国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 在此基础上剔除了金融业样本、ST 和 * ST 类样本、审计费用以非人民币单位计量的样本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 最终得到 19611 个观测值。本文所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境外企业(机构)投资名录》, 并使用上市公司名单及其参控股公司名单与之进行匹配, 得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投资时间等数据。本文使用的审计费用数据、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公司股权结构数据来自于万德数据库, 控股子公司数据来自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产权性质数据来自于 CCER 数据库。此外,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 本文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 1% 和 99% 分位的缩尾处理, 在回归时, 使用稳健标准误并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二) 模型和变量定义

借鉴魏志华和陈逸群等前人的研究^[2], 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来验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并考察由“四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

$$AUDITFEE_{i,t} = \alpha + \beta_1 NUM_OFDI_{i,t} / MV3_OFDI_{i,t} + \beta_2 BIGA_{i,t} + \beta_3 NUM_OFDI_{i,t} / MV3_OFDI_{i,t} \times BIGA_{i,t} + \beta_4 SPE_{i,t} + \beta_5 NUM_OFDI_{i,t} / MV3_OFDI_{i,t} \times SPE_{i,t} + \sum \beta_i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AUDITFEE$ 代表审计收费, 借鉴魏志华和陈逸群的研究^[2],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审计费用取

自然对数来衡量审计费用。由于商务部《中国境外企业(机构)投资名录》没有提供投资金额信息,仅提供了企业名称、投资目的地、投资日期等信息,故本文使用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NUM_OFDI)、 $t-2$ 期至 t 期对外直接投资次数($MV3_OFDI$)两个指标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当上市公司当年审计师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4$)取值1,否则取值0。当年行业内事务所审计客户公司的审计费用占年度行业内所有公司的审计费用比大于0.1时,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SPE)取值为1,表明事务所具有行业专长,否则取值为0。

借鉴 Simunic 等人的研究^[1],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自然对数);负债水平(LEV ,负债/总资产);偿债能力(CV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盈利能力(ROA ,净利润/总资产);成长性($GROWTH$, (当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当年是否亏损($LOSS$,当年营业利润小于0取1,否则取0);资产周转率($SALE$,营业收入/总资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本);企业上市时间(AGE ,当年年份减去企业上市年份加1并取自然对数);事务所是否变更($CHANGE$,如果上市公司在当年变更了会计师事务所则取1,否则取0);上期审计意见(MAO ,上期年报被审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取1,否则取0);审计固有风险(REC ,应收账款/总资产; INV ,存货/总资产);企业产权性质(SOE ,国有企业取值1,非国有企业取值0)。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份($Year$)以及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 Panel A 报告了部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审计费用 $AUDITFEE$ 取自然对数后的均值为 13.401,中位数为 13.305,最大值为 16.167,最小值为 12.101,说明上市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有较大差异。企业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 NUM_OFDI 的均值为 0.102,企业最近3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 $MV3_OFDI$ 的均值为 0.221。“四大”审计 $BIG4$ 的均值为 0.061,说明有 6.1%的企业被国际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 SPE 的均值为 0.207,说明有 20.7%的企业被具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审计。国有企业 SOE 的均值为 0.428,说明样本中约有 42.8%的企业是国有企业。表1 Panel B 按当年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分样本检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当年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样本有 17346 个,审计收费均值为 13.332,中位数为 13.236;当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样本有 2265 个,审计收费均值为 13.929,中位数为 13.754。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结果均表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审计费用显著更高。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 报告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从表2列(1)、列(2)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代理变量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NUM_OFDI)、 $t-2$ 年至 t 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MV3_OFDI$)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审计费用更高,假设1得到支持。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审计师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增加了审计成本;企业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可能提高,增加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产生风险溢价,最终导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审计费用的上升。列(3)、列(4)中,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NUM_OFDI)、 $t-2$ 年至 t 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MV3_OFDI$)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4$)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列(5)、列(6)中,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NUM_OFDI)、 $t-2$ 年至 t 年对外直接投资次数($MV3_OFDI$)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SPE)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研究假设2、假设3得到支持。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Panel A								
变量	观测值	最小值	下四分位数	均值	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AUDITFEE$	19611	12.101	12.899	13.401	13.305	13.719	16.167	0.718
NUM_OFDI	19611	0.000	0.000	0.102	0.000	0.000	1.609	0.303
$MV3_OFDI$	17786	0.000	0.000	0.221	0.000	0.000	2.197	0.470
$BIG4$	19611	0.000	0.000	0.061	0.000	0.000	1.000	0.239
SPE	19611	0.000	0.000	0.207	0.000	0.000	1.000	0.405
SOE	19611	0.000	0.000	0.428	0.000	1.000	1.000	0.495
Panel B								
变量	当年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当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均值检验	中位数检验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AUDITFEE$	17346	13.332	13.236	2265	13.929	13.754	-0.597***	-0.518***

六、稳健性检验

第一,本文采用 PSM 方法应对可能的自选择问题。由于样本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即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投资之前就比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审计费用高,从而无法区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审计收费的增加是否由投资前的“自选择效应”导致。因此,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以前文研究中控制的公司特征、股权结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特征作为匹配变量,采用最邻近匹配方法将当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样本与样本期间一直未进行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样本进行分年度匹配。使用匹配后的样本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前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第二,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了验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审计收费是否显著上升,本文采用多时点 DID 的方法,剔除 2002 年以前进行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样本,以企业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年份为分界点(YEAR_DUMMY),对进行过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进行分析。表 4 列(1)报告了多时点 DID 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审计费用显著上升。

第三,本文剔除当年投资于避税天堂的公司观测值。魏志华和陈逸群研究了中国企业避税地直接投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得出企业进行避税地直接投资显著增加审计费用的结论^[2]。为了排除投资于避税天堂而导致审计收费提升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当年投资于避税天堂的公司观测值进行回归。表 4 列(2)、列(3)表明前文研究发现仍然成立。这一研究发现也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被收取更高的审计收费不仅来自国际避税行为。

第四,本文替换对外直接投资的衡量方法。其一,根据商务部《中国境外企业(机构)投资名录》,我们使用企业当年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FDI)、样本期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次数(TOTAL_OFDI)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详见表 4 列(4)及列(5)。其二,本文从中国研究数据平台(CNRDS)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该平台提供了规模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日期、投资方、交易方、投资金额、投资事件、投资国家(地区)等信息。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名单及其参控股公司名单与该数据平台中的投资方名单进行匹配,得到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等相关信息,并分别使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当年所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总额)和存量(截至当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总额)的自然对数(MONEY、SUM_MONEY)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详见表 4 列(6)及列(7)。表 4 列(4)至列(7)显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被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前文结论仍然成立。

表 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

变量	(1)	(2)	(3)	(4)	(5)	(6)
NUM_OFDI	0.115*** (6.093)		0.090*** (4.605)		0.087*** (4.165)	
MV3_OFDI		0.097*** (6.187)		0.080*** (4.930)		0.076*** (4.449)
BIG4	0.766*** (17.878)	0.791*** (17.611)	0.732*** (15.566)	0.740*** (13.750)	0.744*** (17.561)	0.771*** (17.402)
NUM_OFDI×BIG4			0.151*** (2.913)			
MV3_OFDI×BIG4				0.107** (2.484)		
SPE					0.128*** (7.686)	0.116*** (6.589)
NUM_OFDI×SPE					0.085** (2.447)	
MV3_OFDI×SPE						0.061** (2.194)
SIZE	0.369*** (41.416)	0.363*** (39.724)	0.369*** (41.202)	0.362*** (39.487)	0.365*** (41.540)	0.359*** (39.786)
ROA	-0.057 (-0.582)	-0.083 (-0.842)	-0.048 (-0.494)	-0.072 (-0.730)	-0.053 (-0.543)	-0.076 (-0.776)
LEV	-0.003 (-0.083)	-0.020 (-0.477)	-0.006 (-0.135)	-0.023 (-0.552)	0.002 (0.038)	-0.015 (-0.370)
LOSS	0.075*** (5.316)	0.070*** (4.808)	0.075*** (5.326)	0.071*** (4.846)	0.075*** (5.389)	0.071*** (4.922)
GROWTH	-0.018*** (-2.750)	-0.017** (-2.410)	-0.018*** (-2.748)	-0.017** (-2.428)	-0.017*** (-2.723)	-0.016** (-2.402)
REC	0.155** (2.265)	0.138* (1.930)	0.153** (2.242)	0.137* (1.916)	0.129* (1.911)	0.113 (1.588)
INV	-0.084 (-1.546)	-0.087 (-1.587)	-0.083 (-1.536)	-0.086 (-1.569)	-0.083 (-1.565)	-0.085 (-1.586)
CV	-0.006** (-2.198)	-0.006** (-2.247)	-0.006** (-2.253)	-0.006** (-2.316)	-0.006** (-2.246)	-0.006** (-2.275)
SHRCR1	-0.121** (-2.451)	-0.106** (-2.110)	-0.120** (-2.448)	-0.104** (-2.078)	-0.127*** (-2.607)	-0.112** (-2.261)
SALE	0.130*** (7.677)	0.127*** (7.469)	0.130*** (7.668)	0.127*** (7.466)	0.127*** (7.553)	0.124*** (7.363)
CHANGE	-0.072*** (-7.169)	-0.067*** (-6.270)	-0.071*** (-7.071)	-0.066*** (-6.213)	-0.065*** (-6.585)	-0.059*** (-5.653)
MAO	0.210*** (8.462)	0.226*** (8.332)	0.209*** (8.391)	0.225*** (8.273)	0.208*** (8.514)	0.224*** (8.351)
AGE	0.023** (1.977)	0.025** (2.169)	0.024** (2.086)	0.027** (2.301)	0.027** (2.376)	0.029*** (2.578)
SOE	0.044*** (2.730)	0.043*** (2.609)	0.046*** (2.828)	0.045*** (2.707)	0.043*** (2.727)	0.043*** (2.628)
Constant	5.186*** (28.496)	5.304*** (28.164)	5.195*** (28.433)	5.626*** (28.264)	5.242*** (29.251)	5.634*** (28.784)
Observations	19611	17786	19611	17786	19611	17786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 ²	0.685	0.692	0.685	0.693	0.690	0.697

注:括号内为 t 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误,并经企业层面的聚类调整。***、**和*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PSM方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NUM_OFDI	0.140 *** (5.514)		0.128 *** (5.195)		0.113 *** (4.181)	
MV3_OFDI		0.117 *** (5.737)		0.109 *** (5.397)		0.096 *** (4.415)
BIG4			0.680 *** (6.996)	0.711 *** (7.200)		
NUM_OFDI × BIG4			0.127 (1.260)			
MV3_OFDI × BIG4				0.072 (1.029)		
SPE					0.073 *** (3.184)	0.069 *** (3.048)
NUM_OFDI × SPE					0.092 ** (2.237)	
MV3_OFDI × SPE						0.078 ** (2.45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5.354 *** (20.911)	5.355 *** (20.688)	5.366 *** (20.690)	5.698 *** (20.755)	5.387 *** (21.229)	5.713 *** (21.087)
Observations	10088	9827	10088	9827	10088	9827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 ²	0.670	0.677	0.670	0.677	0.673	0.681

表4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

(多时点DID、剔除当年投资于避税天堂的公司观测值、替换对外直接投资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YEAR_DUMMY	0.028 *** (3.422)						
NUM_OFDI		0.069 *** (2.664)					
MV3_OFDI			0.065 *** (3.922)				
OFDI				0.086 *** (5.838)			
TOTAL_OFDI					0.069 *** (5.853)		
MONEY						0.005 ** (2.013)	
SUM_MONEY							0.009 ** (2.14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6.977 *** (53.424)	5.372 *** (30.482)	5.471 *** (29.766)	5.140 *** (28.254)	5.395 *** (28.487)	5.384 *** (29.048)	5.582 *** (27.690)
Observations	19412	18402	16580	19611	19611	17470	14547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YES	NO	NO	NO	NO	NO	NO
Adj_R ²	0.881	0.653	0.660	0.684	0.687	0.644	0.592

第五,本文分析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由于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检验了产权性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关系的影响。表5显示,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显著提高了审计费用。但相较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非国有企业,国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被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

七、进一步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审计收费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企业的业务复杂度和投资区位复杂度,造成审计资源投入的增加;二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提升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导致审计风险的上升,最终导致审计收费的提升。那么究竟是审计努力增加还是审计风险上升推动了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基于业务复杂度、投资区位复杂度、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三个视角进一步探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审计收费的作用机制。

(一) 作用机制分析

1. 业务复杂度

审计业务复杂度越高, 审计师需要搜集越多的审计证据, 执行越大范围的审计测试, 投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 越增加审计成本。参考 Simunic、Francis、刘斌等人的研究^[1,3-4],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作为衡量业务复杂度的指标。随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推进, 其控股子公司数量会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 这会引起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复杂度的增加,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这类企业时需要耗费更多的审计资源, 进行更多的审计测试, 审计成本增加。同时,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海外经营的控股子公司数量, 而这些公司需要遵守投资国会计制度和准则的规定来披露会计信息, 这增加了合并报表审计的难度, 审计师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来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税制等, 或者聘请境外审计师协助审计工作等, 这无疑也增加了审计成本。

2. 投资区位复杂度

从《中国境外企业(机构)投资名录》来看,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呈现多样性, 流向了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在不同投资动机的驱动下, 企业可能会调整自身的经济业务、资产结构等。由于不同区位的会计政策等存在差异, 海外经营的当地企业需要按当地会计准则要求披露会计信息, 投资区位越复杂, 企业的会计事项、合并报表信息也越复杂, 审计师需要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税制等来判断企业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从而需要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 这对审计测试提出更高的要求, 增加了审计成本。

3. 信息不对称

对外直接投资后企业的会计事项和经济业务更加复杂, 投资于不同区位还会造成海外经营风险的上升和会计信息转换的问题, 这关系到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和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对信息不对称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 需要根据不同投资国和地区的会计准则、税制等要求来披露会计信息, 并将投资国企业会计准则转换成用于报表合并的信息, 这可能会增加会计信息披露的难度。由于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监管环境差异等因素, 企业股东以及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难度和成本都将加大。信息不对称可能增加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 审计师可能会收取风险溢价。另一方面,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造成业务复杂度的增加和各类风险的上升, 企业的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有强烈的动机对企业境外经营情况进行监督, 企业信息使用者对透明、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增加。因此,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后可能会努力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可以减轻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 减少审计费用。因此, 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是否选择采取措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取决于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程度和质量的成本与收益孰高, 进而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

(二) 作用机制检验

参考 Preacher 和 Hayes 的研究^[42], 本文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本文首先使用多元 Delta 方法检验总体中介效应, 然后使用依次检验法以及 Sobel 方法进行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的模型如下:

$$SUB_{i,t}(LOCATION_{i,t}, DSP_{i,t}) = \alpha + \beta_1 NUM_OFDI_{i,t} / MV3_OFDI_{i,t} + \sum \beta_i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2)$$

$$AUDITFEE_{i,t} = \alpha + \beta_1 SUB_{i,t}(LOCATION_{i,t}, DSP_{i,t}) + \sum \beta_i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3)$$

表5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2)
NUM_OFDI	0.184*** (6.039)	
MV3_OFDI		0.151*** (6.378)
SOE	0.059*** (3.616)	0.070*** (4.042)
NUM_OFDI × SOE	-0.149*** (-4.305)	
MV3_OFDI × SOE		-0.121*** (-4.434)
控制变量	YES	YES
Constant	5.208*** (28.687)	5.646*** (28.588)
Observations	19611	17786
Year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Adj_R ²	0.686	0.693

$$AUDITFEE_{i,t} = \alpha + \beta_1 NUM_OFDI_{i,t} / MV3_OFDI_{i,t} + \beta_2 SUB_{i,t} (LOCATION_{i,t}, DSP_{i,t}) + \sum \beta_i CONTROL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SUB* 表示业务复杂度,参考 Simunic、Francis、刘斌等人的研究^[1,3-4],本文使用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数量来衡量这一指标,具体为上市公司当年全部控股子公司数量加 1 取自然对数。*LOCATION* 表示投资区位复杂度,企业当年同时投资于避税天堂、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 3,当年投资于上述区位中的两个区位取 2,仅投资于其中一个区位取 1,没有投资于上述区位取 0。其中,避税天堂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定的 42 个国家为标准;发达国家和地区以联合国 2010 年发布的《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全部 44 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名单为标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一带一路国家级信息服务平台发布的 65 个国家(不包括中国)。*DSP* 表示信息不对称程度,借鉴 Krishnaswami 和 Subramaniam 的研究^[43],本文使用分析师预测分歧度来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参考 Lang 的做法^[44],本文分析师预测分歧度选取年报公布前不同券商对同一家上市公司年度每股收益最新预测值的标准差,并用该公司年末股票收盘价进行标准化处理。

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总体中介效应、三条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都是显著的。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仅在表 6 至表 8 中报告三条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 6 中, Sobel 检验的结果表明业务复杂度这一路径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企业业务复杂度,而更高的业务复杂度显著提升了审计收费。从表 7 中可以看出投资区位复杂度这一路径通过了 Sobel 检验,说明投资区位复杂度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收费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造成投资区位复杂度的上升,审计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不同国家的会计政策和税收制度等,审计投入增加,因而审计费用更高。表 8 的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能够减轻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但对外直接投资后审计收费仍然显著提升,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造成的审计费用提高更多是审计师加大审计努力导致的,而非审计风险提升造成。上述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业务复杂度和投资区位复杂度的提升需要审计师付出更多的审计努力,增加审计资源投入,因而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

表 6 特定路径中介效应检验——业务复杂度

变量	(1) <i>SUB</i>	(2) <i>SUB</i>	(3) <i>AUDITFEE</i>	(4) <i>AUDITFEE</i>	(5) <i>AUDITFEE</i>
<i>NUM_OFDI</i>	0.184 *** (7.180)			0.088 *** (4.711)	
<i>MV3_OFDI</i>		0.183 *** (8.552)			0.068 *** (4.463)
<i>SUB</i>			0.151 *** (14.586)	0.148 *** (14.329)	0.150 *** (14.12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5.096 *** (-18.180)	-5.038 *** (-17.369)	5.833 *** (31.115)	5.940 *** (31.971)	6.037 *** (31.364)
Observations	18717	17053	18717	18717	17053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 ²	0.334	0.345	0.699	0.700	0.707
Sobel 检验				6.419 ***	7.315 ***

表 7 特定路径中介效应检验——投资区位复杂度

变量	(1) <i>LOCATION</i>	(2) <i>LOCATION</i>	(3) <i>AUDITFEE</i>	(4) <i>AUDITFEE</i>	(5) <i>AUDITFEE</i>
<i>NUM_OFDI</i>	1.328 *** (79.446)			0.056 (1.144)	
<i>MV3_OFDI</i>		0.705 *** (58.707)			0.080 *** (4.447)
<i>LOCATION</i>			0.081 *** (6.757)	0.044 (1.401)	0.023 ** (2.07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066 ** (-2.110)	-0.086 * (-1.765)	5.182 *** (28.550)	5.189 *** (28.542)	5.306 *** (28.182)
Observations	19611	17786	19611	19611	17786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 ²	0.892	0.573	0.685	0.685	0.692
Sobel 检验				1.401	2.073 **

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02—2015 年我国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从业务复杂度、投资区位复杂度、信息不对称程度三个视角探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审计收费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审计费用显著更高。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通过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企业的业务复杂度和投资区位复杂度,使得审计师加大审计资源的投入,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审计风险,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审计费用提升更多是审计努力增加导致的。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如下启示:第一,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企业业务复杂度的增加,而且不同投资区位的会计政策、准则、税制等不同,我国审计师不仅需要加大审计力度,还需要通过职业培训提升执业能力,学习并了解不同东道国商业环境、法律、会计政策等,以识别企业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从而提高审计质量;第二,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而言,应提高企业信息的披露程度,降低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树立负责任的、良好的上市公司形象,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第三,对监管机构而言,需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信息,建立和提升跨境监管依据,提高跨境经营财务信息透明度,加大利用跨境经营进行财务欺诈的违法成本,有效维护市场信用。

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目的、投资方式、投资区位较为多样,未来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第一,不同的投资方式例如跨国并购、绿地投资等,涉及的会计准则、会计处理、税法规定存在差异,审计师关注的交易重点不同,未来我们可考虑研究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下审计师的审计努力和审计收费问题;第二,不同的投资区位意味着资本市场监管、会计信息披露要求存在差异,未来我们可分析不同投资区位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信息环境的差异性影响。

参考文献:

[1]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 18(1): 161 - 190.

[2] 魏志华, 陈逸群. 企业避税地直接投资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19(3): 75 - 83.

[3] Francis J R. The effect of audit firm size on audit prices: A study of the Australian marke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4, 6(2): 133 - 151.

[4] 刘斌, 叶建中, 廖莹毅.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深沪市 2001 年报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03(1): 44 - 47.

[5] Stice J D. Using financial and market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pre-engageme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awsuits against audito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1, 66(3): 516 - 533.

[6] O'Keefe T B, Simunic D A, Stein M T. The production of audit services: Evidence from a major public accounting fir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4, 32(2): 241 - 61.

[7] Craswell A T, Francis J R, Talyor S L. Auditor brand new reputations and industry specializ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5, 20(3): 297 - 322.

[8] Hogan C E, Wilkins M S. Evidence on the audit risk model: Do auditors increase audit fees in the presence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 25(1): 219 - 242.

[9] Carcello J V, Hermanson D R, Neal T L, et al. 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audit fee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19(3): 365 - 384.

[10] Becker C L, Defond M L, Jiambalvo J, et al. Th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8, 15(1): 1 - 24.

[11] 伍利娜. 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审计费用披露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03(12): 39 - 44.

[12] 权小锋, 徐星美, 蔡卫华. 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审计费用吗? ——基于组织文化的新视角[J]. 审计研究, 2018(2): 80 - 86.

[13] 沈华玉, 张军, 余应敏. 高管学术经历、外部治理水平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18(4): 86 - 94.

[14] 李莎, 林东杰, 王彦超. 公司战略变化与审计收费——基于年报文本相似度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9(6): 105 - 112.

[15] 王雄元, 高曦, 何捷. 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基于文本余弦相似度视角[J]. 审计研究, 2018(5): 98 - 104.

[16] Basioudis I G, Francis J. Big 4 audit fee premiums for national and office-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 in the United Kingdom[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Theory, 2007(26): 143 - 166.

[17] Francis J R, Reichelt K, Wang D. The pricing of national and city-specific reputations for industry expertise in the US audit marke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5, 80(1): 113 - 136.

[18] 韩洪灵, 陈汉文.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战略吗? ——来自中国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08(1): 53 - 60.

[19] 李爽, 李晓, 张耀中, 等.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投资与审计定价——以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市场为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1(5): 26 - 34.

[20] 宋子龙, 余玉苗. 审计项目团队行业专长类型、审计费用溢价与审计质量[J]. 会计研究, 2018(4): 82 - 88.

[21] Ettredge M, Greenberg R. Determinants of fee cutting on initial audit engagem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0, 28(1): 198 - 210.

表 8 特定路径中介效应检验——信息不对称

变量	(1) DSP	(2) DSP	(3) AUDITFEE	(4) AUDITFEE	(5) AUDITFEE
NUM_OFDI	-0.002 *** (-3.181)			0.107 *** (5.755)	
MV3_OFDI		-0.001 ** (-1.995)			0.087 *** (5.408)
DSP			-0.824 *** (-3.427)	-0.772 *** (-3.243)	-0.789 *** (-3.31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115 *** (-13.633)	-0.102 *** (-12.283)	3.978 *** (16.035)	4.192 *** (16.969)	4.236 *** (17.767)
Observations	12928	12746	12928	12928	12746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 ²	0.265	0.262	0.704	0.706	0.710
Sobel 检验				2.271 **	1.710 *

- [22] Deng P. Outward investment by Chinese MNCs: Motivation and implications[J]. *Business Horizons*, 2004, 47(3): 8-16.
- [23]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24]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 [J]. *管理世界*, 2012(11): 45-56.
- [25]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 *经济研究*, 2014(12): 126-142.
- [26] 宗芳宇, 路江涌, 武常岐.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经济研究*, 2012(5): 71-82+146.
- [27]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 *经济研究*, 2014(5): 160-173.
- [28] 顾雪松, 韩立岩, 周伊敏. 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国—东道国”视角的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 2016(4): 102-115.
- [29] 李梅, 柳士昌.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 *管理世界*, 2012(1): 21-32+66.
- [30] 赵伟, 古广东, 何元庆. 外向 FDI 与中国技术进步: 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 *管理世界*, 2006(7): 53-60.
- [31] 毛其淋, 许家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J]. *世界经济*, 2014(8): 98-125.
- [32] Bell T B, Landsman W R, Shackelford D A. Auditors' perceived business risk and audit fees: Analysis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1, 39(1): 35-43.
- [33] Barron O, Pratt J, Stice J D. Misstatement direction, litigation risk, and planned audi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1, 39(3): 449-462.
- [34] Bedard J C, Johnstone K M. Earnings manipulation risk, corporate governance risk, and auditors' planning and pricing decisio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79(2): 277-304.
- [35] Lyon J D, Maher M W. The importance of business risk in setting audit fees: Evidence from cases of client misconduc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5, 43(1): 133-151.
- [36] 宋衍衡. 审计风险、审计定价与相对谈判能力——以受监管部门处罚或调查的公司为例[J]. *会计研究*, 2011(2): 79-84+97.
- [37] 漆江娜, 陈慧霖, 张阳. 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J]. *审计研究*, 2004(3): 59-65.
- [38] Defond M L, Jambalvo J. Debt covenant viol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accrual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4, 17(1-2): 145-176.
- [39] Solomon I, Shields M D, Whittington O R. What do industry-specialist auditors know?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9, 37(1): 191-208.
- [40] 蔡春, 鲜文铎.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07(6): 41-47+95.
- [41] Owosho V E, Messier W F, Lyneh J G. Error detections by industry-specialized teams during sequential audit review[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3): 883-900.
- [42] Preacher K J, Hayes A F.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J]. *Behavioral Research Methods*, 2008, 40(3): 879-891.
- [43] Krishnaswami S, Subramaniam V. Information asymmetry, valuation, and the corporate spin-off decis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 53(1): 73-112.
- [44] Lang M H, Lundholm R J. Corporate disclosure policy and analyst behavior[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 71(4): 467-492.

[责任编辑:刘 茜]

Do OFDI Companies Pay More Audit Fees?

CHEN Dong^{1,2}, GUO Xilin¹, PAN Min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Guizhou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re, Guiyang 550025, China; 3. Tianjian Accounting Firm, Shanghai 200122, China)

Abstract: Taking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5 as samp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OFDI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n audit fees, and finds that enterprises with OFDI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audit fees. “Big 4” accounting firms and accounting firms with expertise in the industry charge higher audit fees for OFDI companies. The placebo tests show that OFDI increases the business complexity and investment location complex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hich makes auditors increase the input of audit resources and thus leads to higher audit fees. At the same time, OFDI alleviates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reduces the audit risks faced by auditors, indicating that the increase in audit fees caused by OFDI is more due to the increase in audit efforts than the increase in audit risks. The above research not only enriches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OFDI on audit fe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motes further research on OFDI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 OFDI; audit fees; business complexity; investment location complexity; accounting firm size